

近十年国内五四运动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陈 阳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 要] 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中国的意义,无论从政治、思想、文化抑或社会等领域,都有着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梳理一下近十年(1998 年--2007 年)以来五四运动(本文就“广义”的五四运动的而言)研究现状和动态。从宏观层面看,五四运动的研究领域、研究层次、研究阶段、研究路向呈广泛化、深入化、明确化、多样化的趋势;从微观层面看,五四精神,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意义;“五四运动”名词的提出时间;“五四时期”时段划分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成果。当然,五四运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一)研究的不平衡性;(二)缺乏评论的主体性;(三)概念运用的“模糊性”。因此,我们在今后的五四运动研究过程中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加强对五四运动中非主流人物的研究;2、加强对五四运动中各种群体、团体、学派和出版物的研究;3、对五四运动中的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制衡与消长状况、相互关系、实际效果以及其深层原因等分析与解构;4、加强对五四运动相关的重要概念的论述和论证;5、加强对五四运动与其它重大事件的关联研究;6、推进五四运动的区域性研究。

[关键词] 五四运动;五四时期;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0X(2008)01-0008-06

一、研究现状

事实上,自五四事件事发时至今,学者们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从未间断,各阶段的研究成果亦是十分显著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更是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蔚为壮观的“五四学”研究热潮。本文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当前五四运动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地梳理与概述。

(一)宏观层面

1. 研究领域广泛化

随着各门科学的进步和学术研究的推进,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呈现出了从政治领域向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扩展,各领域内具体问题研究的开拓,各学科方法的相结合和交叉运用等特点。譬如,长

期以来,部分学者对于五四运动性质往往局限于“政治革命”、“政治运动”的界定,这主要体现在建国前期的部分著作研究论文之中,对于五四人物的评价,往往局限于其在政治方面的影响,这是未能对其本人以及思想在文化、社会等领域进行通盘考虑的结果,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李大钊和胡适,对于李大钊的研究往往只看到其作为早期的马列主义者这一方面,没有看到在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五四运动,这些新成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前五四运动的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不足,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如对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系、五四运动与儒学的关系等。

[收稿日期] 2008-01-09

[作者简介] 陈阳(1981-)男,湖北武汉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2005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综合性著作方面有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的《五四运动与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人民出版社, 2001) 将五四运动囊括到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的“大历史”视野中, 并对整个五四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探讨。王章维等人合著的《“五四”与中国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 层次分明地论述了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意义。高力克的《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 2003) 一书, 对五四时期思想界上存在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的分析, 揭示各思想流派之间相互对垒与分化、发展与消长的复杂纠葛关系, 以及它们对于社会的影响。专题性著作方面有 张艳国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花城出版社 2003) 则通过对封建末世复辟帝制根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道统”专制文化核心的一面地批判, 进而引申到对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关系的考究, 并对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与文化进行了多纬度、多层次的研究。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孙郁的《鲁迅与胡适——影响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等, 则对五四时期若干历史人物的思想与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1]

2. 研究层次深入化

从五四运动研究的层次来看, 逐渐突破仅从五四事件本身出发、仅将其作为具体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历史事件的比较浅显的研究层次, 而尝试着从历史本体论、史学理论等更高层次地进行探究。值得一提的是, 1999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主题, 会议上来自国内外的近百名学者, 就五四运动研究当中的几个方面的论题, 进行了广泛、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欧阳哲生认为, 在五四运动研究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话语”系统, 造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形象: 一是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从社会主义文化路径构建的五四形象, 如瞿秋白、毛泽东等; 第二种是文化保守者以复兴传统文化为旨归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难, 如杜亚泉、梅光迪等; 第三种是自由主义者的观

点, 他们对五四精神的强调主要在思想自由和个人主义。葛兆光从另一角度谈了五四形象的问题。他认为作为具体历史事件的五四, 现在已经终结。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五四, 只是“历史叙述中的五四”, 这种“五四”形象的确立取决于叙述者个人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同时, 他进一步对“历史叙述中的五四”作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五四, 即是研究者通过对五四时期的具体文献、回忆、报道的研究, 以过去人的心情和语境进行不断的解释和阐述而建构起来的五四。广义的五四, 则是研究者对过去和现在的五四运动研究成果的阐述、研究以及反思的结果。同时, 他还提出一个与“历史叙述中五四”相区别的、经常出现在各种象征性纪念活动中的、一个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和时代背景需要, 以支持政治合法性与权力合理性为目的的“纪念的、象征的五四”。针对五四形象的确立问题, 欧阳军喜指出, 五四的形象确立存在一个不断的“层累造成”的过程。^[2]

3. 研究阶段明确化

五四运动涉及到的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就决定了五四运动研究必然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的研究工程。因此, 若要在五四运动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既要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新、全面的理解, 又必须对五四运动的研究过程进行更为客观、科学的把握。这就要求学者必须对五四运动研究过程中各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特征的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学者朱志敏的文章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国内五四运动的研究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作者在这篇文章中, 从五四运动研究者的选题中心、选题倾向、价值尺度和研究方法出发, 将我国国内研究五四运动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总结各阶段研究特点的基础上, 提出研究热点与时代主题相关联是不同时期的学者们确定研究选题的共同特点。这三阶段分别为: 第一个阶段: 1919 年 - 1949 年; 第二个阶段: 1950 年 - 1977 年; 第三个阶段: 1978 年 - 2005 年。^[3]

4. 研究路向多样化

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并非是“政治运动”、“爱国运动”、“启蒙运动”等几个简单的词语所能囊括和诠释的。五四运动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更是显得尤为重大和深远。这一趋势, 仅从社会各

界关于“五四运动评价的路径选择与转换”的发展过程来看,便可见一斑。学者郭若平提出:当今,五四运动的意义早已突破了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事件”的藩篱,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各界对五四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五四形象的层累塑造,五四“已成为人们认识那个特定年代的一个政治和文化“符号”——即“一种被简称为‘五四’的历史象征”、“‘五四’成了评价政治与文化问题的强势坐标。”这种“符号”在不同时期的研究者眼里,蕴含着不同的含义、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人们——也可当作一种抽象的称谓,将此符号视作解释中国现代世界的“精神家园”。他还进一步提出,1919年以来的研究学者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经历了由感怀性到学理性的认知过程,由政治史范式,到政治史与文化史相结合范式、革命研究范式、思想史研究范式以至反思评价范式等,逐步走向成熟的学术研究范式的探索历程。^[4]

(二)微观层面

1. 五四精神的研究

五四精神具有无穷的魅力,正是这种特殊的魅力一直激励着、鼓舞着和吸引着众人对五四运动进行着不间断地研究和探讨。那么,什么是五四精神呢?关于五四精神,可谓众说纷纭。

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有的认为是理性精神、个性解放,有的认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有的认为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或变革,还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等。

陈敏荣认为五四精神就是“从文化上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作者指出五四志士从文化入手,提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认识到科学和民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发出国民主体意识觉醒的呼唤,第一次提出人的现代化问题。“纪念五四运动,要强调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更要高度重视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从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5]

袁庆新认为五四运动的主旋律是“强调人的价值,宣扬人的主体性,主张人的自由自主”。而“民主、科学、爱国都是围绕着人的觉醒和解放提出来的”。如果没有人的觉醒,没有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是不可能产生五四这场以人的思想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的。^[6]

学者哈战荣则对五四精神作了通盘的考察,他认为:“五四精神是以反帝爱国为核心,由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探索与创造精神、奋斗与牺牲精神相互渗透、相互贯通而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与灵魂。”^[7]

其实,爱国主义不仅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五四运动中一个旗帜鲜明的时代主题,更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程始终的一条重要的历史主线。

2. 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意义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近代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尝试,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学者冯琳提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8]

萧超然、宋月红在政治发展的层面上考察五四运动的历史实绩,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融入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资料、认识根据,并参与了对相应政治主体的塑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近现代变革。^[9]

3. “五四运动”名词的提出时间

关于“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最早的提出时间这个问题,为当前学术界所认同的主要存在着两种主流的提法:第一种是,罗家伦在《五四精神》中提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与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3期,这一说法为胡适等人所证实,第二种说法则认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见于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于1919年5月18日发表的《罢工宣言》,这一说法又先后为周策纵、萧超然等学者所认同。近年来,针对以上两种主流提法,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杨琥提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应该是1919年5月14日。他通过对《罢工宣言》与《致各省各团体电》两篇电文文末所署时间先后顺序的比较、在电文所涉及内容方面、《罢工宣言》对《致各省各团体电》的继承关系以及1919年5月19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与1919年5月20日出版的北京《晨报》由于地域的缘由而对两文发表时间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充

分论证了“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于1919年5月14日发布的《致各省各团体电》。^[10]

4.“五四时期”时段的问题

关于五四时期的界定问题一直是五四运动研究过程中一个切关宏旨的重要命题和热点问题。虽然在这方面的相关论述较多,但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又由于各专家、学者们的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一直不曾停止,这使得各种观点呈现出交相杂陈、相互纠结的状态。诚然如此,如果对众多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理顺,还是能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各家之言中发现一些共识的地方。当前,关于“五四时期”时段的界定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国内学界主流观点将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作为其上限,而以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为下限,这主要体现在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等部分高等学校系列教材之中;第二,国内外部分学者有以“五四前后”为提法的,这种提法可以被看作以1917年作为上限,以1927年为下限,该提法主要体现在我国学者陈崧先生编辑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美国学者林毓生所著《中国意识的文集——“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等著作之中。第三,国内也有学者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作为起点,以1923年科玄论战的兴起作为终点的,持这种观点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艳国等。第四,也有部分学者回避了对“五四时期”的界定问题。黄元启的《中国现代史》(上、下册)就以1919年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从而回避了“五四时期”的这一概念。^[11]

5. 其它方面的研究

(1)五四人物研究。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以前不为人们所重视的非重要人物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正如桂展鹏认为: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新道德,是以个人主义为道德原则的,其实现途径是易家族本位为个人本位,易禁欲主义为合理利己主义,根本目的就是要冲破封建主义樊篱,求得人的个性解放,拯救民族危亡。^[12]又如,冯夏根指出:罗家伦是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杂志的主编之一,是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是运动重要的组织者之一。而且,他是“五四

运动”一词的较早使用者,并最早撰文阐述了五四精神。因此,罗家伦堪称五四运动的健将。^[13]

(2)五四群体研究。政治群体与革命团体因其独特的政治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的优势,一直成为历史舞台和现实社会的宠儿,它在学术界和学术研究中的直接体现是:造成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研究客体“政治化”倾向。这种极端倾向在近年来学术研究中,得到了较大的改观:研究者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唯政治论”的学术宗旨,并逐渐将视野扩展到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群众身上,即“历史眼睛往下看”。如知识份子群体、商会等研究。正如朱成甲指出: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这就使当时主张教育救国与文化救国的思潮在北大相汇合。北大通过蔡元培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迅速出现崭新的面貌,而其最主要的则是形成科学民主的校格、健全奋斗的人格、开新向上的学格与个性自觉的群格,从而使北大在教育上、思想文化上的前卫性和领先性,为北京大学以后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心与主导者奠定了基础。^[14]又如王友成谈及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信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则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5]

(3)五四运动与关联事件间的关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必然与周围的事物产生不可割裂的联系。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必然与历史发展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发生必然关联。因此,在研究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必然牵扯到与之关联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活动的研究。萧超然强调: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五四运动介于辛亥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它弥补了辛亥革命之不足,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

(4)五四运动的区域性研究。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往往比较注重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研究,对于其它地区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近年来,部分学者在后一方面作了较大努力。如田子渝的《武汉五四运动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林建曾的《试析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变革思潮》(《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李健的《论南昌的五四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二、研究不足

(一)研究的不平衡性

倾向于主流意识形态、重要事件、主流人物的研究,对于构成“五四形象”所必不可少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小事件、非主流人物研究不足;正面的研究多,反面的研究少;研究中偏重于宏大的历史叙述,缺乏生动鲜活的、个性化的风格;而且一些宏观的研究论著,都在自觉地认同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认同导致研究中主观臆断的成分增多。

(二)缺乏评论的主体性

研究者往往对于其中某些重要问题的评论缺乏自己的学术见解。叙述有余而评论不足,研究者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缺乏主体性参与意识和触摸历史的严肃。

(三)概念运用的“模糊性”

过分强调“历史”的模糊性,抹杀史学研究五四运动具体历史事件研究的界限,忽视史学研究的独立学科性质。

三、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几点看法

由此可见,近十年来,学术界在五四运动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是丰富的,成绩是显著的,这正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然而,研究中的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当前新形势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在新的研究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新的问题、面临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正确和清醒地认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好准备。在以后的五四运动研究过程中,我们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加强对五四运动中非主流人物的研究

对于已有相当成果的要加强和深化、没有研究到要开拓和挖掘。不能只注重领袖人物等一类的研究,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等;更有重点的、有目的的加强对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有重要影响的二类、乃至三类人物的研究。同时,务必要从实事求是出发,“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切忌囿于仅仅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化、贴政治标签、扣政治帽子)的角度的研究问题,应该运用历史的、科学的方法的研究问题,结合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以及受教育程度、个性特征、文化心态等多纬度,通过

分时期和分层次、横向和纵向的等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对于其境遇给予“同情的理解”,进而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文化性格并给予社会的定位。

(二)加强对五四运动中各种群体、团体、学派和出版物的研究

加强知识分子、商界和华侨等群体的社会心态、社会角色、社会定位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对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主流学派和非主流乐派和以及相关出版物的研究。

(三)对五四运动中的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制衡与消长状况、相互关系、实际效果以及其深层原因等分析与解构

比如:工人、农民、地主、商人、知识分子、政府机构等各种力量各自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反应以及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又如:留日学生、留欧学生、日本学界等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四)加强对五四运动相关的重要概念的论述和论证

概念是论点的细胞和基石。概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论点的成立与否;概念的合理程度直接影响到论点可信程度。没有正确、合理的概念作为基础的论点,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举例说明:“五四时期”、“五四运动”的具体概念各是什么;“五四事件”与“五四运动”的具体概念,二者有无关联、以及其关系如何?等等。

(五)加强对五四运动与其它重大事件的关联研究

加强专题化研究,这有助于如实、全面的反映五四运动的真实情况。将五四运动置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之中,研究其与关联历史活动、历史主题的关系。譬如:五四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的关系等。

(六)推进五四运动的区域性研究

一方面,继续加深对北京、上海、武汉、南昌、贵州等地区的五四运动研究,力争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另一方面,加强对其它地区的五四运动研究。只有各地区五四运动研究工作的获得相对平衡发展,并对各地区研究成果的系统整合,才能形成一个尽可能客观的、真实的、全面的和完整意义上的五四运动研究的新气象、新风貌。

[参考文献]

- [1] 吴效马. 近五年来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述略[J]. 教学与研究, 2004,(5).
- [2] 欧阳军喜. 五四运动研究历程回顾与检视座谈会综述[J]. 历史研究, 1999,(3).
- [3] 朱志敏. 八十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J]. 中共党史研究, 2006,(2).
- [4] 郭若平. “五四”评价取向的历史转换[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7,(10).(总第 324 期).
- [5] 陈敏荣. 对五四精神的重新审视[J]. 理论月刊, 2002,(5).
- [6] 袁庆新. “五四”精神与现代化[J]. 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2).
- [7] 哈战荣. 五四精神的再认识[J]. 思想政治工作, 2005,(05).
- [8] 冯琳. “五四精神与 20 世纪中国历史道路”学术研讨会综述[J]. 高校理论战线, 1999,(05).
- [9] 萧超然, 宋月红. “五四”新文化与现代中国[J]. 东方, 1999,(04).
- [10] 杨琥. “五四运动”名称溯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43 卷.
- [11] 张艳国. 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3.
- [12] 桂展鹏.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构建的新道德[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7,(3).
- [13] 冯夏根.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总第 111 期).
- [14] 朱成甲.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兼论北大与教育救国、文化救国思潮的内在联系[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第 37 卷(总 199 期).
- [15] 王友成.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原因剖析[J].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3), 第 19 卷.

Research Summary for Some Problems of
"May 4th Movement" in Recent 10 years in China

CHEN Yang

(History Graduate School, Hubei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Wuhan, Hubei 43007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May 4th Movement" in recent 10 years (1998-2007) from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views.

Key words: "May 4th Movement", "May 4th Period", research overview

[责任编辑 陈会荣]